

[封面故事]

文明探源学术史背景下的凌家滩

张小雷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
2019 年至今担任凌家滩遗址发掘领队

1987 年至 2024 年，凌家滩遗址共进行了 16 次发掘。

在最近的一次发掘后，考古发掘者对凌家滩的特点和价值的总体认识为：凌家滩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是中华文明的先锋。

在文明探源学术史的背景下，凌家滩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关键地点，这一点已得到广泛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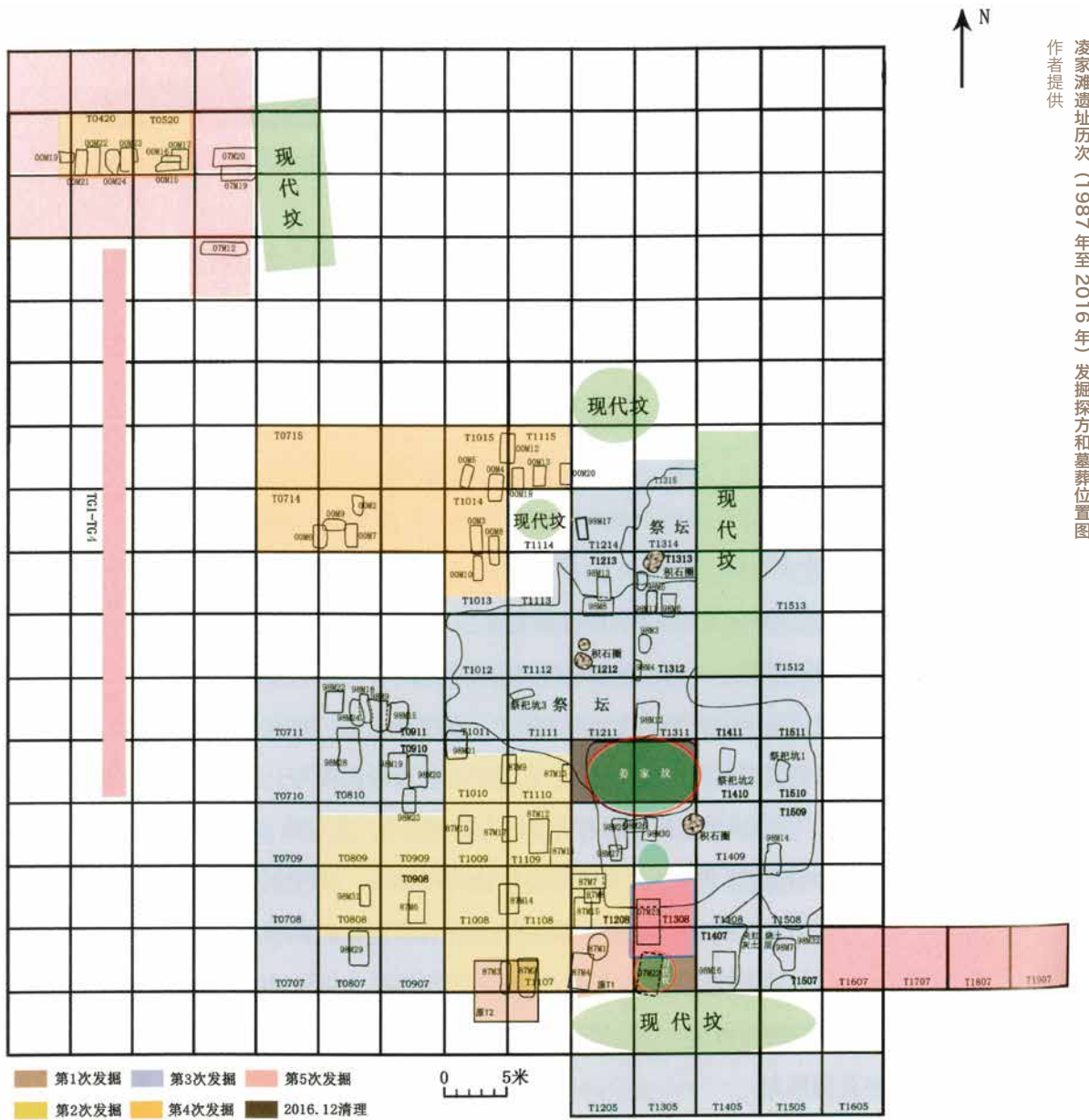
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天然使命。

中国考古学是在 20 世纪初国家、民族乃至中华文化面临多重危机的背景之下诞生的，因此其自形成之初就肩负着重建中国早期历史、回答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学科使命。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史前文化时空框架的初步建立，以及一系列史前城址、高等级贵族墓地等的发现，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问題再次成为中国考古学家需要面对

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浙江余杭反山和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墓地的发掘和简报发表。^{〔1〕}

新发现引起研究热潮

稍后，在安徽江淮中部巢湖附近凌家滩墓地的发掘，同样让学界眼前一亮。1987 年 6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领队对凌家滩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试掘），发掘位置在出土玉



器的现代坟西侧进行。发掘面积仅 50 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 4 座，尤其是 87M4 出土了玉人、玉龟、玉版等 129 件让人耳目一新的玉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87 年 11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领队对凌家滩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位置在第一次发掘区附近进行。发掘面积 275 平方米，发现 11 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虎首璜等三百六十余件玉器。

凌家滩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发表在《文物》1989 年第 4 期^②，同期发表了《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③，认为该玉片图形是原始八卦。简报的结语是按 20 世纪 80 年代惯例的文化史研究背景下的措辞：“遗物具有江淮地区土著文化的特征。应是江淮地区土著民族古淮夷族的文化遗存”，“长方形玉片可能与古天文有关，又与玉龟腹甲放置在一起，值得进一步探讨”，并没有提“文明”二字。

《中国文物报》1989 年 4 月 14 日第二版以《凌家滩遗址展现新的文明曙光》为题报道了凌家滩发掘的简讯，作者是殷伟、张敬国。^④同年，俞伟超发表了对凌家滩玉器和社会的认识，认为 87M4 “墓主生前不仅对这两件玉器有使用的特权，而且还有占有的特权。就使用的特权而言，其身份应当是专职的巫师。就占有的特权而言，则恐怕还是具有某种世袭特权的氏族、部落的首领。……最初的巫师尽管有其特殊地位，却不一定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但当人类社会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时，至少在某些地方，神权首领也就成为政权首领，后来则神权和政权又分离开。……占有玉牌、玉龟等物的凌家滩遗存中的神权首脑，岂不很可能也是生产的、军事的、政治的首脑吗？此地此时，岂不正是处在我国考古学者当今正在着力探索的文明曙光的阶段吗”^⑤。

也就是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学界热点时，凌家滩就已经开始参与了。而且，当时多是用“曙光”这类词汇来界定文明起源的初期阶段。

之后的几年，学术界对玉龟、玉版的研究成为热点。饶宗颐、李学勤、王育成等均有专文发表。^⑥

1990 年，牟永抗、吴汝祚发表《试谈玉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指出“辽西的红山文化、太湖的良渚文化，显然是两支古老的用玉部族。最近发掘的临近巢湖的凌家滩墓地出土的大量玉器表明，包括鄂东在内，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可能有别于上述两文化，是另一个琢玉中心地区”^⑦。这既是“三大玉文化中心”名称的由来，也认为这三者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一个重点。

1998 年 10 月至 11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领队对凌家滩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仍以墓地为主，面积达 1600 平方米，另在山岗东、西两侧的裕溪河北岸发掘了 225 平方米，以了解居址的情况。此次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 29 座，出土了玉人、玉鹰、玉龙等 315 件玉器、玉料，最为重要的是发现第二次发掘中认为的沙石层其实是一处以石子、石块为材料的祭坛，墓葬围绕或打破了祭坛。在东面的石头圩地点发现了以红烧土填充基槽的隔间房址。

此次发掘简报发表于《考古》1999 年 11 期。简报结语：“随葬有大批高规格的玉礼器，不但是财富、权力的标志，又是统治者祭天祀地、沟通神灵的法物。宗教信仰在凌家滩社会中煊赫的地位和作用。……凌家滩所出的玉礼器，为研究中国古代早期文明起源，在精神领域里提供了极丰富的信息。它对后起的良渚文化和殷商青铜文明礼仪制度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无



凌家滩文化 立姿玉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1:2

图片转引自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编《玉耀长河：凌家滩文化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47 页



凌家滩文化 坐姿玉人

高 8.7 厘米 宽 2.4 厘米 厚 0.8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98M29:16

图片转引自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编《玉耀长河：凌家滩文化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48 页



凌家滩文化 玛瑙钺

长 18.1 厘米 刃宽 8.1 厘米 厚 1.15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98M20:1



凌家滩文化 玉冠饰

长 6.6 厘米 高 3.6 厘米 厚 0.3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15:38

图片转引自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编《玉耀长河：凌家滩文化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30 页

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在器类、器物形制、祭坛等文化内涵方面，凌家滩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祭坛作为神圣的祭祀圣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变革。祭坛和玉人的出现，标志着氏族社会由神权向王权过渡。墓主可能已有身份、地位、等级方面的差异。应是巢湖流域一支相对独立发展的考古学文化。”^{〔8〕}

通过对简报结语的分析可以看出发掘者相关认识的变化，对凌家滩遗址的认识有明显进展，首次提出凌家滩文化，注意到凌家滩对良渚文化的影响。这些认识可以说基本奠定了学界对凌家滩的认识。

随后的2000年《凌家滩玉器》图录出版，附有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所写的三篇文章。张忠培认为87M4墓主人是位既掌握军权又握神权的显贵。^{〔9〕}严文明认为了解凌家滩玉器，首先要了解它所出土墓地的情况，特别是它的年代和文化性质，考察墓地周边的环境、考察它所依托的居住遗址的情况。与一般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凌家滩文化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贵族阶层，反映等级差别的礼制似乎也还没有形成；高档玉器看不出有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因而不具有礼器的性质；玉人自然也不会是什么礼器。总的结论是：凌家滩玉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是这一历史阶段已经到来的一种



凌家滩文化 玉髓管
长 5.9 厘米 外径 1.6 厘米 孔径 0.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4:68



凌家滩文化 抛光工艺喇叭形耳瑯
高 1.3 厘米 最大直径 1.7 厘米 底径 0.9 厘米
底厚 0.1 厘米 最薄处 0.05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98M16:41



证据。凌家滩玉器的发现，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起始阶段不可多得的实例。^{〔10〕}

2000年，朔知发表了《从凌家滩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11〕}一文，这是直到目前已发表的凌家滩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研究中最经典的一篇。其核心要义是首先归纳了凌家滩文化的内涵：制作大量精美玉石器；出现大型祭坛和贵族墓地，产生了中心聚落和聚落群，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祭祀和宗教已成为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礼仪；玉龟、玉版反映的核心还是占卜，占卜活动已相当规范。文章认为凌家滩文化和相近时代的其他文化，已为中国文明起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孕育了中国古代文

明的多种特征，而凌家滩文化更由于其年代较早和内涵丰富，成为促进中国文明诞生的先行者之一。

2006年，凌家滩发掘报告出版，附有严文明先生的序言。严文明先生将墓地分为六个墓区，每个墓区可能代表一个家族。各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从事职业和财富状况都有差别。严文明先生认为凌家滩的文化性质最接近于南京北阴阳营墓地，二者甚至可能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在凌家滩之后，文化发展的重心可能有所转移。至少玉石工业的重心转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里去了。……事实上良渚文化玉器制造的各

凌家滩文化 折角玉璜

长 21.3 厘米 端宽 4.1 厘米 厚 0.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4:34





凌家滩文化 玉镯
外径 7.5 厘米 厚 0.4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7M23:318



凌家滩文化 条形玉璜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7M23:75

种技术，除了微雕式的线刻不见于凌家滩外，其他技术在凌家滩都已经采用”^{〔12〕}。

可以看出，每一次重要考古发现都会促进大家对凌家滩聚落和文化的进一步解读，墓地、祭坛和玉器始终是凌家滩最显著的标志。

探源工程促成新工作

21 世纪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重在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重新系统梳理中华文

明的形成过程。其中，第一阶段(2004 年~2005 年)全称是“公元前 2500 年~公元前 1500 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重点围绕晋南豫西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文化分布范围和华夏文明起源问题开展工作。第二阶段(2006 年~2008 年)，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 3500 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

第三阶段(2010 年~2012 年)，全国共有三处都邑性聚落(陶寺、二里头、良渚)、十处区域中

心聚落被纳入到课题重点发掘研究中，其中就包括安徽凌家滩遗址。相较前两个阶段，第三阶段最大的变化就是加强对距今 5000 年以前的中心性聚落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事实。凌家滩遗址作为 5000 年前的区域中心性聚落被纳入到这一课题中，课题名称为“含山凌家滩遗址及所在裕溪河流域聚落形态研究”，研究工作以调查和勘探为主，包括遗址本体和周边聚落两个方面，最重大的进展是在凌家滩遗址发现有内壕、外壕，初步构建了凌家滩聚落的大体格局。

从此，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官方研究工作中，凌家滩始终是绕不开的一个地点，甚至是最关键的地点。这在后续的探源工程阶段中得以体现。

第四阶段（2013 年～2015 年），“含山凌家滩遗址及所在裕溪河流域聚落形态研究”作为子课题继续被纳入探源工程之《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课题。自 2013 年开始，课题连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

通过区域系统调查，得知裕溪河流域最早的聚落始于距今六千年前后，在五千多年前集中出现了一批聚落，这批聚落多数与凌家滩最早时期大体同时开始，大都早于凌家滩繁盛时期，凌家滩最辉煌时它们已多数衰落；在凌家滩之后一段时期，其周边很少有聚落存在。

通过勘探全面了解了凌家滩遗址的面积、结构、大致功能区：遗址分布沿河北侧、山岗及两侧分布，面积约一百四十万平方米；聚落分为居住区和墓地两大区域，两区之间有内壕沟分界，成为生死两界的界线，但中间仍有一处通道相连；在内壕沟西侧 500 米外，还有一道壕沟。

这一时期对凌家滩遗址的发掘共进行了三



凌家滩文化
玉饰件
长 3.6 厘米
宽 1.6 厘米
厚 0.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
编号 87M4:96



凌家滩文化
兔形玉梳背
长 6.8 厘米
高 1.9 厘米
厚 0.2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
编号 87M10:7

次，地点分别为凌家滩遗址东部的石头圩生活区、内壕沟西段和北段、西南部的南半坎生活区等处，合计发掘面积约八百四十平方米。揭示了内外壕的堆积结构。更主要的进展是开展了较多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在遗址绝对年代、生业经济、环境考古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复原凌家滩社会的全貌提供了丰富的科学实证。

2012年，张忠培指出：凌家滩这类遗存所处社会发展阶段，是已进入文明时代了。87M4、07M23墓主都应是既掌握军权又掌握神权的人物。这类人物掌握的国家或政权，当是政教合一的政权或国家，可称之为神王之国。^{〔13〕}

2012年召开的首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凌家滩以“中华文明的曙光”开始被广泛宣传。

新工作成果助力探源

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2020年～2024年）开始实施，“凌家滩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继续被纳入该课题研究。课题学术目标是进一步揭示凌家滩遗址的聚落布局。发掘主要集中于三个地点：岗地东南端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墓葬祭祀区西侧地点、外壕北段地点。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至2022年，凌家滩遗址主动性发掘地点均位于岗地东南端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2020年揭露面积500平方米，2021年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2022年发掘面积500平方米。通过发掘，确定了该大型红烧土遗迹的范围、堆积结构和年代，其年代为凌家滩文化最繁盛的时期（距今5500年～5350年）。证明其是一处大型的与祭祀有关的公共建筑基址。

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对墓葬祭祀区西侧休息广场区域进行发掘，发现一处重要的燎祭遗存，共出土器物二百六十余件，其中石器一百四十余件、玉器七十余件、陶器四十余件。石器以钺占绝对多数，拼合后完整石钺六十余件。玉器也有一些新器形，如齿轮形器、椭圆形牌饰、梳形器等。

2023年至2024年，继续对燎祭遗存西侧区域进行发掘，以研究揭示该遗存所依托的土台建筑的全貌，全面了解祭祀区的西界。

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对外壕北段地点进行发掘，了解了外壕的宽度、深度、堆积结构等，证明遗址北端存在重要的防御设施。

凌家滩的这些重要新发现，成为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重要成果，对总结中华文明起源形成阶段提供了关键素材。

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探源工程新进展。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五千八百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凌家滩遗址同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中心性遗址。

同时介绍到：凌家滩遗址上有迄今所知5500年前后可以确认的最大规模的聚落，两重环境围住的面积有140万平方米；此前，在内壕北门外边发现一座祭坛以及墓地，已经发掘69座墓葬，2022年在内环壕中间部位发掘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与环壕走向一致，长边88米，短边40米，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下面还有更早期的建筑，表明这个位置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居住房屋，这座建筑体量很大，应该代表聚落的等级很高；去年还发掘了内壕北门外人工堆筑的“祭坛”，今年找到了它的西边界，今后会逐步认定其东边和北边的边界；去年在祭坛上发现一座祭祀坑，坑内出了二百五十多件器物，包括大石钺60件，以及不同种类的玉器、陶器，说明这里祭祀的仪式恐怕跟墓葬里随葬品的葬仪是不同的。

至此，凌家滩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关键地点得到官方再次认可。

凌家滩文化 陶鬯

通高 20 厘米 口径 8.7 厘米 腹径 14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11:9



凌家滩文化 带盖陶罐

通高 8.5 厘米 口径 7.6 厘米 底径 7.8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9:57、87M9:2



凌家滩文化 单耳陶杯

通高 9.7 厘米 口径 3.7 厘米 底径 6.5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12:29

凌家滩与中华文明

凌家滩祭祀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复原当时祭祀场景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的认识；二百余件器物的出土，丰富了凌家滩陶器玉器的种类；同时，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龙首形玉器等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是凌家滩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以大型红烧土遗迹为代表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发现，深化了对凌家滩聚落布局的认识，证明凌家滩存在超大型的高等级的公共礼仪建筑，并且存在明确的祭祀功能，为大型墓葬、精美玉器的存在寻找到了相匹配的高等级的生活遗存。

结合凌家滩近年考古新发现，再综合考量三十多年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目前可以认为，凌家滩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已经表现出其已具有中华早期文明的部分特质：区域中心，大型工程，社会的分化，宗教的完善，礼仪的形成，高端手工业。尤其是大型仪式中心的营建、基于宇宙观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以钺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加上玉器的技术和理念，均对此后良渚早期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凌家滩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是中华文明的先锋，这是2024年前后凌家滩考古发掘者对凌家滩特点和价值的总体认识。

当然，由于很多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的研究结论必然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是错误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尤其是对凌家滩聚落本体格局的演化的历程，比如凌家滩岗地的独立性、



凌家滩文化 巨型石钺
长34厘米 宽23厘米 厚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87M4:1

墓葬祭祀区的全貌结构堆积结构、“祭坛”的全貌结构、大型红烧土遗迹的全貌结构、岗地北部区域的堆积结构等等，都是未来十年、几十年需要解决的问题。紫



凌家滩文化 玉管形饰 (六件)
高 1.5 厘米
径 1.3 ~ 1.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
编号 87M4:111、87M4:87、87M4:88

凌家滩文化 扁方圆形玉饰 (四件)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
编号 87M4:62、87M4:66、
87M4:121、87M4:122

注释

-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 [3] 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
- [4] 殷伟、张敬国《凌家滩遗址展现新的文明曙光》，《中国文物报》1989年4月14日第2版。
- [5] 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 and 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9月。
- [6] 饶宗颐《未有文字以前表示“方位”与“数理关系”的玉版——含山出土玉版小论》，《文物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0年10月。钱伯泉《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制式盘》，《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12月。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1992年第4期。李学勤《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中国文化》第六期，1992年9月。

- 李斌《史前日晷初探——试释含山出土玉片图形的天文学意义》，《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王育成《含山玉龟玉片补考》，《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10月。
- [7] 牟永抗、吴汝祚《试谈玉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日第3版。
- [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
- [9] 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
- [10] 严文明《凌家滩玉器浅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
- [11] 朔知《从凌家滩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 [12] 严文明《序》，《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
- [13] 张忠培《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杨晶、蒋卫东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中华玉文化特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页。